



堀田善卫

日本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于1954年底创作完成的《时间》，是日本作家也是海外作家撰写发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的叙事以南京屠城的蒙难者陈英谛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展开。在1938年“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日记的开篇处，“我”发现日军情报官桐野对七年前的柳条湖铁路爆炸事件实为日军自导自演的事实竟一无所知，于是错愕不已，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受难者视角的感慨：

除日本人之外的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他却不知道。如此看来，南京的暴行事件恐怕也不为一般日本人所知。如果不去抗争，我们连“真实”都无法守护，也无法将它告诉给历史学家。

上世纪末以来，中日政府及民间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上的差距日趋拉大，确凿印证了这段预言的预见性。同时，在这段历史面临记忆危机的严峻现实的反衬之下，如此坚定的守护历史真实的受难者的声音，出自一个日本作家60多年前的文学书写，其远见和勇气就愈加显得可敬可贵。

作为一名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在人生经历与创作题材方面，都与中国有深度的接触和交集。二战末期的1945年3月，堀田善卫曾赴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任职，并在上海经历了日本战败。同年底，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1947年1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1945年5月，他曾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一起游览南京。此

堀田善卫《时间》：

用“鼎的话语”刻写复生与救赎

□秦刚



次南京之行，成为他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

回国后的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1952年初，他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获芥川文学奖。同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日本正式恢复了国家主权。

长篇小说《时间》起笔于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争停战不久，作者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全篇的六个章节曾以“时间”、“诗篇”、“山川草木”、“受难乐章”、“存在与行为”、“回归”为题，自1953年11月至1955年1月间，分别刊载于《世界》《文学界》《改造》等综合期刊。1955年4月，新潮社出版了《时间》单行本，这一年正值日本战败10周年。

前一年零九个月的在华经历，使堀田善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写作特质。他能够在作品中借助来自于外部的他者化视角，反观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影响，自省日本的战争责任。《时间》的这种创作意识非常突出，作品写作之际，虽然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都曾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但那场劫难中被害者的声音却被压抑和屏蔽于公共传媒与公众话语背后，更没有传达到海外。堀田善卫很早就意识到该事件作为侵略战争中最血腥和残暴的一幕，必将成为战后重建中日关系的焦点与核心性问题。

为了对那场惨绝人寰的事件展开可信的叙述，小说选取了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陈英谛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小说通篇由他在屠城前后跨度约10个月的日记构成。

身为侵略战争发动方的日本作家，却选择了被侵略一方的中国人视点，叙述蒙难者的心灵创伤，见证加害者的暴虐无道，这是小说《时间》作为一部日本

战争文学的最为独特之处。这种视角的对调，若非有正视历史的良知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以及对于他者的想象力，便难以为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努力克服自我局限，超越个人的身份与视野，穿越时空去换位思考。

小说主人公陈英谛是在民国海军部任职的一名文职官员，在司法部任职哥哥携家眷随政府部门迁往汉口，陈英谛和临盆待产的妻子莫愁及5岁的儿子英武一起，留在了已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并接受了为政府部门收集情报的任务。陈英谛一家和南京陷落前从苏州逃难而来表妹杨妙音，共同亲历亲见了日军入城后的百般屈辱与危难。在辗转进入金陵大学难民区避难后，陈英谛被日军认作军人，强行拉到西大门外集体处决，全家人都就此离散。怀有身孕的莫愁与腹中胎儿以及沦为街头乞儿的英武，都惨死于日军的暴虐；陈英谛在集体屠杀中侥幸逃生，在逃亡路上被日军征用为挑夫。数月后，陈英谛终于逃回城内，发现自家楼房被日军情报官桐野占用。陈英谛以充当桐野的伙夫为掩护，利用外出机会与地下情报员联络，夜间秘密发电向重庆传递情报。陈英谛的伯父却充任伪职，与日军勾结贩卖鸦片，坑害同胞。几个月后，在假扮磨刀人潜入城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找到了遭受日军轮奸后自杀未遂的杨妙音。身患性病及海洛因中毒症状的杨妙音被接回陈家，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她渐渐恢复了生存意志，和磨刀人策划共同逃出南京。

在按照叙事时序梳理出来的概要性情节链之上，构成作品血肉的，是身处劫难之下几度死里逃生的主人公心路历程和精神告白。他以不懈的思考深化人性认识，确立直面残酷现实的主体意识，在精神伤痛的自我救治中升华苦难体验。因此，关于敌我双方的观察审视，对自身境遇的体味自省，关于人类与战争、生命与死亡、人性与道德等哲学命题的深思等等，占据了大量篇幅，使作品具有“思想小说”的倾向。在蒙难者和记录者之外，主人公作为思考者的一

面，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分身与自我投射，堀田善卫借主人公之口反复自问：“为何一定要将如此惨状记录下来呢？明确地说，那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身的复生。”这里的“我自身的复生”对于主人公而言，意味着他在目睹了人性扭曲的暴虐与邪恶后，直面民族苦难，重新获得生存勇气的精神“复生”，同时，对于作者而言，则意味着对自己身为加害国民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担当与自我救赎。

本部作品写作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自然是战后不久日本与国际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惟其如此，作品呈现出的观察与思考，与冷战初期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就其对历史的感知与领悟方式而言，注定与大屠杀蒙难者的实际感受会有所不同，也不可能同被害方的认知取向完全吻合。这部作品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其独特的叙述方式与视角。作家超越自身的身份与视角的局限，以趋近极限的文学想象力让自己身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直面人类劫难，感同身受地正视战争加害。以反思战争为前提的这种视角转换，其意义不止于一次写作的挑战，也是对历史与战争深化思考的思想实践。因而，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时间》也是对战争反思颇具深度的作品之一。

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紫金山、扬子江、明孝陵神道的石人石兽、马群小学的旗杆等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景观与物象都曾反复出现，有效营造出历史浩劫中特定时空的丰富意蕴表达，寄意凝重而深远。陈英谛妻子的名字“莫愁”，也构成了金陵古都的换喻。而陈英谛在残垣断壁之间偶尔回到的一尊烟气蒸腾的黑鼎，更成为通篇文字中最核心的意象。黑鼎上方，犹如“人的血液和脂膏化作蒸汽，烟气氤氲地向空中升腾”，仿佛象征着这一瞬间的、世界上的南京”。这无疑属于典型的象征化的文学修辞。然而，陈英谛却曾明确表示，记下这部日记时他所留意的，就是决不使用文学的话语修辞去记述，因为庸俗化的文学修辞，有可能削弱叙事本身的真实质感。当陈英谛遇到了那尊黑鼎后，便决意用“鼎的话语”“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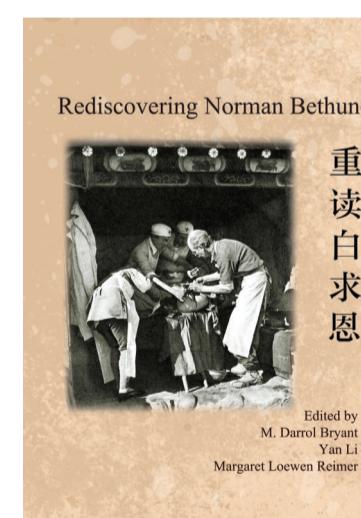
正如面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一样，我们是无法彻底了解此刻从南京这尊鼎的上方升腾起的蒸汽的具体含义的。可是，只要有去了解的意志，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提问者，成为对话者的一方。

叙述者在无意间将单数的“我”转换成了复数的“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叙述更像是对于不分国界的后世之人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的具有启悟意图的提示。鼎既意味着对历史性时间的永久性的铭刻与凝固，同时，也是后世之人以自身的良知与智识跨越时空对话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物。如今，坐落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国家公祭鼎，是2014年首次国家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其两耳三足的形制与小说里的鼎完全相同，恰如小说中的那尊注满罹难者的血泪而沸腾的黑鼎跨越了世纪，在劫后废墟化成的祭坛上重现。国家公祭鼎上，也刻有“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铭文。

《时间》这部作品不论在堀田善卫的创作中，还是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本价值。发表后也曾得到过日本国内部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但因日本文坛及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刻意沉默和集体失语，并未引发应有的热议和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笠原十九司曾指出，如果《时间》成为畅销书或被改编为电影，有可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识产生影响，让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人的战争记忆的一部分。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在一般读者的文学阅读及文学史叙述中，《时间》遭受到了长久的漠视与遗忘。2015年岩波书店将这部长篇小说收入“岩波现代文库”中再版，时隔数十年后，终于重新进入日本读者的阅读视野。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时间》的中译本。

《重读白求恩》的诞生

□[加]戴罗尔·勃兰特



国的决定。

来中国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邀为论坛提交一篇论文。回到加拿大后，我们最终决定编辑出版一个文集。文集《重读白求恩》内容广泛，有诗歌、散文，也有颇具挑战观点的学术论文，均涉及白求恩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生活经历。

文集的第一篇是茱蒂丝·麦克琳·米勒创作的一首诗《诺尔曼·白求恩》。米勒是瑞纳森大学荣休教授，专治加拿大文学。她生长于蒙特利尔市，自幼便从家人口中听到有关白求恩的各种故事。这首诗为后面的所有作品奠定了基调。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来自作家玛格丽特·罗文·雷默。她长期担任《曼依派记者报》主编。第一篇《追寻使命——白求恩》记叙了她在赴华之前所听说过的白求恩，第二篇《仪仗队装饰的舞台》则记叙了她在中国以及离开中国之后所了解到的白求恩。

马克·皮埃尔是拉瓦尔大学研究生，他在文章中对比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的不同接受态度。从1930年至60年代末期，加拿大人要么忽视他，要么反对他。皮埃尔还注意到加拿大法裔及英裔族群对白求恩的不同态度。1970年代初期，白求恩被定义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士，从那时起，他的影响持续扩展，直至今日。自从皮埃尔·特鲁多成为加拿大总理后，白求恩在加拿大文化中的地位才开始转变。

退休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撰写过多篇白求恩专著，文集收录了他两篇解读白求恩的文章。《这将成为我的名字》一文叙述了白求恩与祖父的关系，《在爱中受伤》一文的核心则是白求恩与其母亲的关系。莱斯布里奇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带有缺陷的家庭环境。他认为，白求恩的母亲是个过于死板固执的基督教教宗信徒，她给白求恩带来了心理伤害。白求恩在祖父的温暖怀抱寻求庇护，并用祖父的名字诺尔曼作为自己的名字。文章挑战了白求恩成长于温馨和睦家庭的观点，对于家庭关系是如何塑造了白求恩一生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白求恩研究的难题之一就是他与女性的关系，包括他在西方以及在中国的那些岁月。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拉瑞·汉纳特在文章《我不是你男人——白求恩

与女性》中批评了指责白求恩追逐女性的看法。其中，汉纳特对女性如何评价白求恩所作的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丹尼斯·鲍克的文章《探索白求恩跳动的心房》是以小说家的手法引领读者思考。他所关注的既非史学家们所在意的历史真实，也非英雄豪杰之情，而是“对未能表白的心声之一窥”。鲍克认为，这一窥的曝光，是在一个人陷入失败与困境之时，而非狂欢伟大胜利的时刻。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返回加拿大之后曾陷入沉默，鲍克就此挖掘了他内心深处的世界。小说采用长信形式，虚构了白求恩给从未谋面的女儿写信，以极具穿透性的洞察力，展示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白求恩。

李彦在中国出生长大，上世纪80年代移居加拿大。文集入选了她的文章《留给丽莲的东西》，李彦与读者分享了她对白求恩的看法，描述了白求恩与在中国遇到的女性的关系、丽莲·古治和她儿子比尔·史密斯的故事，以及比尔是如何在母亲遗物中发现白求恩与毛泽东合影照片的。2013年，李彦历经波折寻找到了比尔·史密斯。数年之后，她才铺平道路，成功地把这帧照片原物带到了中国。

在《五十年再读白求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对白求恩与毛泽东合影照片回归中国一事所产生的反馈。作者是中国作家张承志，文章以洋溢的激情诠释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给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如前所述，在白求恩生活的时代，还有不少来自欧洲、印度、北美的医生也曾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斗，并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虽然他们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但却无人能企及白求恩这样崇高的地位。为什么？此疑问隐含在戴罗尔·勃兰特撰写的《缅怀白求恩》一文中。勃兰特重温了白求恩的生平足迹，从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最后抵达中国。在他整个人生旅途中，白求恩一直处于寻找、挑战、对自我提出更高要求的过程中。他常常对自己不满，但依旧不断追寻。正是在中国，白求恩才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投入不知疲倦的工作中，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施行了数不清的外科手术，不仅救治战场上的伤兵，也救治一切需要帮助的村民百姓；他把普通中国百姓培训成医护人员，并建立了一系列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规章制度。他接连不断地给各方频频写信，祈求资金赞助。在这些信里，他谈到了自己的满足与欣慰。

这些文章为理解白求恩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观察角度。文章作者们在赋予白求恩人情味的同时，也诠释了他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人生重要转折的深远意义。

(翻译:李彦)

书讯

帕维奇作品《双身记》中译本出版

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双身记》中译本。

在小说开端，作者向读者表明，自己已经离开人世，逝世以后的他（他的第二个身体）讲述了一个双重身体的故事，这就是《双身记：一部虔诚的小说》，披露他本人以及其他有趣人物分身的秘密，触发读者对血肉和精神双重本质的探索。小说中的三段恋情各自以一位确有其人的塞尔维亚文学家为主角：扎哈里亚·奥弗林在18世纪中期的威尼斯从事文学创作；加伯列·斯蒂芬·帕维奇·凡茨洛维奇活动在18世纪的前半期，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境

内颠沛流离，从事创作；书中惟一一位当代塞尔维亚作家，便是生活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作者本人。

纵观三位作家的创作史实，《双身记》可称得上是一部以塞尔维亚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在小说中作者的妻子是根据帕维奇夫人的原形而创造的人物。

有评论称，该书在帕维奇的作品谱系中又增加了一位身份特殊的新成员。帕维奇不经意间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本，它们拓宽了当代小说和人类想象力的边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及非线性语句，令该作品染上了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